

愈炸愈强的抗日“兵器库”

□张桂林


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不到两年时间，华北、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。地处长江上游，据夔巫之险，乘舟楫之便，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。

在担当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同时，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。自全面抗战爆发，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，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“武器弹药库”。八年间，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、弹药。为打败日本侵略者，山城近十万兵工人，在物料、装备短缺，生活清苦、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，满腔热忱，争分夺秒“创造犀利的武器”。

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

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，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，跨立石碑之上，面朝东方，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。雕像下方的岩壁里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。

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。而它的前身，则是创建于晚清，以“汉阳造”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。80多年前，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，这座当时的“兵工砥柱”几经迁徙，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。在此之前，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业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。

“西迁运动，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。”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，全面抗战爆发前，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，布局也极不合理，几个大厂，如汉阳兵工厂、上海兵工厂、金陵兵工厂、济南兵工厂、巩县兵工厂等，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。随着战事恶化，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。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，就成了必然选择。

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“卢沟桥事变”前，就开始计划兵工业企业内迁事宜，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，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，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，才陆续动迁，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。

专事机枪、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，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，于

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。因时局紧迫、运输工具奇缺，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。无奈之下，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，寻机抢运。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，但并未抱太大希望。

12月6日，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。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，找来群众协助，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，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。随后一路顶风冒雪，水陆兼程，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，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。

钢铁乃武器之母。随着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，日军兵锋直指武汉，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——包括汉阳铁厂、钢厂、大冶铁厂、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，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。

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

自淞沪会战以来，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，造成枪械、弹药大量损耗。历史档案记载：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，“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，概计数量，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。”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。1937年11月，军政部报告“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”。

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、弹药需求之急迫，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，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，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。然而，西迁以后，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，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，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。危难时刻，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，力求迅速重建，早日开工，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。

战时的重庆，缺电、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。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，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，由于这里未通电，只能靠自发电，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，却又无柴油可用。生产工作只能从“炼油”开始。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，找来几个旧油桶，自己动手锻打铁器，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，经过一番摸索，竟然炼出了柴油，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。

除物料匮乏外，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。1938年10月之后，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，轰炸重庆市区。沿江布局以图运输、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，成为重点轰炸对象。尽管困难重重，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，还不断改进、仿制新式武器，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“血肉之躯”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，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，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。以二十一厂为例，在老式“汉阳造”基础上，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，于1943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，比上述两型步枪更灵便、更安全，杀伤力也更大；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，能立射、跪射、卧射，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，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；新制一二〇迫击炮，最大射程5000米，较法国同类产品减轻一半，且操作灵便，发火精准。

同志们，猛进！猛进！

生于南京，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厂子弟郑洪泉，今年已90岁高龄。他至今记得80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，“刚搬到重庆时，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。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、下到普通工人，都在默默地拼命。其中最可敬的，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！”

毕业于日本东京东帝国大学的李承干，1919年进入汉阳兵工厂，1931年任金陵兵工厂厂长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，此后的二十一厂不断扩产壮大。

“李承干一直单身，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家。14平方米的办公室，他和主任秘书、工务处长三人办公，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。不管多晚睡，有事随时要叫醒他。”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后专心研究李承干的郑洪泉，对“老厂长”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：预料到战事日紧，设备、物资肯定会短缺，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到外采办；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，改进机枪、迫击炮；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，但生产上要求极严格……

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，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，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，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。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。有时甚至喃喃自语：“炸我们吧，炸我们好。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，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。”

为激励职工斗志，鼓舞大家战胜困难。李承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悉的著名诗人、学者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。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，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：

“战以止战，兵以弭兵，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。创造犀利的武器，争取国防的安宁，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。勤俭求知，廉洁公正，迎头赶上，尽我智能，工作是不断的竞争。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，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。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，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。量欲其富，质欲其精。同志们，猛进！猛进！同志们，猛进！猛进！”从此，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、嘉陵江畔。

“自儿离家已经年余，记得曾在本年四月间，于泗县郑集老家信一封，不知大人收到否？回音否？如家音回报，可惜我也不能等收了……”

这是一封70多年前的平安家信。20岁出头的新一军连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在抗日作战间隙，把思念匆匆装入信封。不久后，他与所在连队的81名战友，在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壮烈牺牲。

今天，这封家信信封和李云鹏烈士证明书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珍贵馆藏，静静诉说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。

1943年春，侵华日军企图围困六塘河北岸我党政领导机关。为掩护百姓和部队转移，新一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在连长白思才、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率领下，在刘老庄与敌展开激战。

“大哥原名李亚光，李云鹏是他参军后自己起的名字，他从小就立志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，上高小时曾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‘卖国可耻，救国光荣’的誓言。”李云鹏的妹妹李爱云说。

李爱云告诉记者，李云鹏1920年出生，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，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，李云鹏被编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。1941年，苏鲁豫支队改编为新一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，李云鹏任政治指导员。

刘老庄阵地上，4连全体指战员仅82人，他们面对的日伪军数量众多，装备精良。

敌大队骑兵首先向4连阵地涌了过来，战士们依托交通沟周旋抗击。眼见冲锋无效，敌又集中炮火，对阵地猛轰。工事被摧毁，立即修复；掩体炸塌了，背包填上去；人员负伤了，包扎起来继续战斗。

从1943年3月18日的拂晓到黄昏，82人、81人、80人……一个一个地递减，到不成连、不成排、不成班。李云鹏也负伤了，浑身血迹模糊。他动员大家毁掉武器、销毁文件。他们不给敌人留一样东西，自己也没打算活下去。潮水般的敌人再次向阵地压来，勇士们用刺刀，用枪托，用铁锹，甚至用牙齿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是役，4连以全体牺牲的代价毙敌170余人，伤敌200余人。

战后第3天，淮阴的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，组建了新的4连，被命名为“刘老庄连”。“哥哥牺牲后，父亲给家里的兄弟姐妹改了名，我们的名字里，都有了‘云’字。”李爱云说，为了感念82名烈士，当地政府和百姓修建了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，并植下青松82棵。

2019年，“刘老庄连”现任指导员杨晋专程赴陵园祭扫，在得到上级和当地有关部门允许后，他将一枚松枝和一抔黄土带回连队，安放在连队荣誉室的英烈墙下。“每年，我们都会把烈士的英雄事迹讲给新兵，在烈士殉国日，现任指导员要向老指导员李云鹏报告连队工作。”杨晋说，“‘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’是代代相传的连魂精神。”

血战刘老庄

一封平安家书背后的抗战故事

□丁鹏